

書寫底層世界：無家者的危殆生活

時間：111年5月27日(五)10:00-12:00

地點：線上直播

主講人：黃克先(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)

主持人：丁志昱(國立馬公高級中學校長)

記錄：國立中正大學人文沙龍團隊

位於艋舺公園旁的龍山寺遠近馳名、香火鼎盛，除了是當地的信仰中心外，也是許多外國觀光客造訪臺北市的熱門景點之一，假如搭乘捷運前往該地，勢必會途經艋舺公園，但公園內的情景卻往往令人卻步。打開 Google 地圖上對於這個空間的評論，其中充斥著髒亂、惡臭、失序、複雜、危險等形容詞，有些人不解為何在臺北市這個首善之地、歷史文化鼎盛的龍山寺旁，會存在著一塊彷彿「平行世界」的化外之地？事實上，艋舺公園每隔一段時間，總會因為社會事件躍上新聞版面，更是加深人們的負面印象。不論是民意代表、里長或當地居民，許多人認為有關單位理當嚴加控管、強力取締，歷任臺北市政府確實也屢次投注資源試圖整頓，只是一次次的專案計畫，似乎仍難以扭轉大



圖一：講座合影(左至右)：主持人丁志昱校長、主講人黃克先教授、人文沙龍計畫主持人陳國榮教授

眾的負面既定印象，這些印象的源頭往往指向流連、盤踞此處的遊民。主講人黃克先教授指出，臺灣民間對於這些居無定所、經常露宿街頭或公共場所的經濟弱勢族群有許多稱呼，而中央或多數地方政府在正式法條、文件裡則是使用「遊民」一詞，這個字詞隱含著政府難以約束管制、遊蕩叛逆之意。部分公益團體或工作者則試圖使用「街友」或「寒士」等詞彙來扭轉上述官方稱呼的負面意涵，然而不論使用「友」或「士」等正向詞彙，似乎與這些群眾被社會大眾忽視、敵視的現實狀況差距甚遠，反而有種欲蓋彌彰的違和感。

近年有非營利組織與學者主張使用「無家者」的稱呼，一則對應於英文的「the homeless」，一則指涉這個群體所共有的極為不穩定的居住狀態。「無家者」在中文脈絡及傳統漢人家庭倫理觀念的驅使下，容易使聽者直接聯想到「無家庭者」，亦即「不顧家」、「叛離家庭」、「背離孝悌精神」等負面道德標籤，反而有汙名化效果，在實際田野研究中也曾有人對此一稱呼感到不自在。不過，在比較各詞彙的優劣後，黃教授仍選擇使用「無家者」，但英文則注釋為「unhoused people」而非「homeless」，強調無家者是「無家屋可居者」，而非「無家庭者」。群體稱謂的更迭與選擇，其實也反映或投射我們對於這些邊緣群眾的想像與偏見，然而正如我們朗朗上口的話語：「人是社會的動物」，無家者經歷多面向的社會排除，諸如經濟、社會福利、空間、政治參與與人際互動，社會普遍認為無家者不存在人際連帶（interpersonal ties，以下簡稱為連帶），此共識不僅充斥大眾媒體與學術文獻，實際接觸過無家者的志工或義工，乃至於無家者自身也如此認為：「都嘛酒肉朋友，有錢就靠過來，沒錢閃遠遠的！」這些被視為是城市之瘤的無家者，其身影往往是游離與孤立的，在所處的環境中無力採取行動或開展關係。既然他們無法建立社會關係，似乎也不該成為社會學的研究課題。但真的是如此嗎？

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百餘年前的美國芝加哥。在 19 世紀初期，芝加哥僅是個幾百人居住的小鎮，但隨著歐洲移民湧入，以及內戰後被解放的大量南方黑人遷移至此，人口迅速倍增，到 1930 年代時已是人口達 330 萬的大型城市。城市的發展也意味著豐富的零工機會，於是吸引了眾多游移工人（the hobo）聚集於此，這些找尋臨時工作的底層無家男性，往往棲息於公共空間，並以放蕩不羈的生活風格挑戰當時主流社會對於家庭、婚姻、工作與空間的既有想像，菁英及中產階級因此感到恐懼不安、鄙夷厭惡，害怕都市空間成為犯罪或疾病的溫床，將這群人視為道德敗壞與犯罪暴力等社會問題的發源，避之唯恐不及。不過，這樣的都市情境卻孕育出早期美國社會學重要的發展課題，一群學者以實證精神深入這些被視為危險、失序的地域進行長期觀察與研究，瞭解其背後

更為深層的結構因素。其中奈爾斯·安德森 (Nels Anderson, 1889-1986) 是最為年輕的成員之一，他致力於邊緣群體內部秩序及文化意義的再發現，揭示其所受到的不平等處境，以及受主流價值掩蓋的真實人性，這些議題也成為相關都市民族誌的重要研究焦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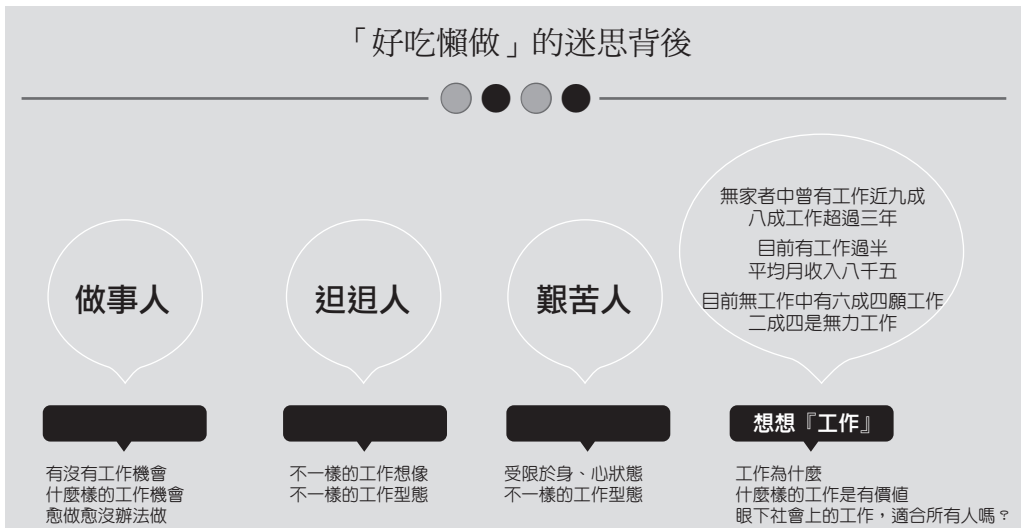
臺灣不乏運用參與觀察法研究邊緣群體的精彩學術作品，然而分析偏重有所不同，對於這些群體如何建立、維持、看待彼此關係與內部秩序也較少著墨。黃教授於是秉持以身為度、親臨現場的都市民族誌精神，展開長達五年的綜合觀察，其中 2016 年 6 月至隔年 6 月更是移往艋舺公園與無家者一同生活，逐漸在大眾刻板迷思之外，發掘出一個綿密且立體的社會世界。他發現生活於公園的無家者即便身處不利脫離的外部環境中，彼此間仍會形成社會網路來交換物質、情感支持、勞務互助、資訊（特別是關於工作的情報）交流等，以之適應或對抗生活困境，並讓生而為人的尊嚴、意志、認同、關愛、渴望得以在這些連帶中實現，築成一個有秩序的社會生活。隨著與公園住民的相處時間愈長、互動程度愈加深入，黃教授逐漸認識到他們具有四個面向的連帶：與原（生）家庭的連帶、工作上建立的勞動連帶、在公園打造之新家庭的伴侶或擬家人的連帶，以及公園住民彼此間的社群連帶。此外，由於艋舺公園長期聚集眾多無家者，其周遭也遍布以協助無家者為主旨而設立的幫助網絡。大體而言，臺灣弱勢者的周遭始終存在著由國家社福體制、宗教團體與民間「善心人士」所組成的幫助網絡，三者深遠影響社會邊緣群體的生活狀態。這樣的幫助網絡在艋舺公園無家者周遭也可發現，他們以不同的運作邏輯與相互搭配發揮作用，支持著無家者的日常生活所需。

當發現無家者彼此間的豐富連帶後，另一個問題隨之浮現：為何他們對外往往避而不談或摒棄這些連帶？黃教授指出，分析無家者種種的連帶時，重點不在於「多少」，而是「如何」的問題，前者意味著他們有多少種連帶，或者能帶給他們多少東西，後者則是無家者如何運用與看待這些連帶。如前所述，無家者明明有豐沛的幫助網絡，可在他人協助下改善生活狀態，但為何往往維持不了多久，或旋即大起大落，最終仍無法脫離流浪？事實上，各種不利的外在因素潛藏其中，使得這些連帶看似完好，但卻是不穩定、難以預測、隨時崩壞的「危殆」(precarity) 狀態。根據黃教授的觀察，他們認為連帶意味著弱者，這與多數無家者生長於臺灣經濟起飛時期的社會底層有關，外界總認為無家者是好吃懶做、不願工作的群體集合，但事實上無家者間瀰漫著一股必須工作的社會期待。據其統計，艋舺公園內無家者有九成曾有工作，有八成工作超過三年，目前有工作者則超過半數；無工作者有六成四願意工作，僅兩成四是無力工作。

不過即便有工作者，其平均月收僅 8,500 百元，對於支付臺北生活所需仍是力有未逮。

黃教授進一步將無家者概分為三類：「做事人」多是貧寒農家出身，懂得自食己力維持生計，遂以種種勞力、派遣工作營生，他們相信「打拼出頭天」、「凡事靠自己」，也有期盼「貴人」相助的渴望，外界總賦予無家者愛喝酒的形象，但事實上「做事人」更喜愛咖啡幫助他們思考工作；「迥迥人」則是擅於操弄人際關係獲取利益，以靈活的方式與秩序共舞，識別機會及靠近有資源者，藉由得體的言語或表演滿足所需；最後，「艱苦人」因身心狀態較差，必須仰賴外界提供物資，他們藉由性別分工、團體作戰的方式共享資訊、資源，並以節制欲望來度日營生。事實上，多數男性無家者傾向在謀生上展現陽剛氣質，他們相信真正的男人必須獨立靠自己，避免運用連帶。其次，對無家者而言，與其他無家者產生關係，就意味著在未來可能有受牽連、被利用的風險，相較於利用連帶獲取的利益，無家者更擔憂未知的意外，眼下是迫於無奈才藉由連帶獲取資源，若能出現替代途徑，原本存在的連帶便很容易被棄置，故對於現階段連帶抱持著「將就」心態。最後，無家者身處的環境缺乏主流制度（如法律的婚姻關係）的支持，致使無家者在連帶遭逢危機時，在評估是否付出更多以繼續維持的情境中，更傾向果斷地放棄。

除無家者間的連帶，對其生活十分重要的幫助網路，也同樣影響著無家者看待及運用連帶的態度。黃教授在多次與無家者的聊天中，發現他們僅將這些



圖二：黃克先教授將無家者分為「做事人」、「迥迥人」、「艱苦人」三類
（圖片來源：講者簡報）

幫助團體視為「貴人」，而非家人、朋友、伴侶；也曾聽聞社工批判將個案當成朋友的方式，是有失專業及不切實際，最終將導致兩者的受傷。這顯示兩者間的連帶性質與運作方式是單向而非雙向，且雙方被預定有上下階序地位差異，隨著雙方互動而加強了彼此的界線。這種連帶的維持，是極具工具性與目的性，依幫助網絡的鐵三角——社福體制、宗教團體與「善心人士」——來看，各自有其助人的性質與側重：社福體制基於公共利益，希望改變無家者的偏差行為，維持並鞏固社會主流的價值與秩序；宗教團體是以打造信仰體系的理想信眾為目標；「善心人士」則在過程中，有意或無意地將無家者當成襯托道德優越地位的工具。黃教授認為這種彼長我消的「助人—受助」連帶，是藉由物質上的所得帶來象徵上的剝奪，助人者與受助者兩個群體的界線愈加清晰，愈難形成穩定、平等的關係，也加深社會對無家者既有的負面形象。因此，幫助網絡的連帶，對於許多無家者而言也強化了其「弱者」感，在生活上可能是種負擔，而非助力。不難發現，即便無家者有著豐富連帶交織而成的社會世界，但因這些連帶相對脆弱且具負面效果，致使在艋舺公園的無家者過著危殆生活。

黃教授刻意使用「危殆」形容無家者的生活模式，是為凸顯他們生活中的不穩定與未知，除了物質缺乏、露宿公共空間帶來的不確定，在日常互動或因受歧視、持續被噤聲，看著自身的生存機會在各派利益集團角力間被強奪，僅能消極、被動、無尊嚴地等待他人施捨的物資與服務，屈就於主流價值，並感受低人一等的階級差異。這也可能致使幫助網路提供的資源或服務，因為個人尊嚴或避免汗名的情況下，不能真正輸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。無家者若選擇與幫助網絡維持關係，也可能損害其自我認同的象徵資源，進而影響無家者間本已脆弱的連帶。對無家者而言，動用或建立連帶，或許能在短時間內帶來所需資源，但可能意味著在不確定的炸彈上拉上引信，將自身生計或尊嚴認同在未知的將來一次炸毀，於是每次是否建立或動用連帶的抉擇都是場博弈難題。不過，他們並非孤離地棲身於暗處，而是在社會交往的過程中構築提供安全與情感支持的連帶關係，緩解危殆工作及居住型態所帶來的傷害。長期來看，無家者擁有連帶的危殆性，極易導致無家者感受到被背叛、被離棄、被孤立，削弱了連結他人的意志，加強了凡事靠自己的邏輯。最後，黃教授強調，無家者的連帶其實可不必然危殆，透過政策的調整、公民團體或你我的行動，仍是有助於打造較為平等、穩定且正向的連帶，幫助無家者確立自身存在價值，適應外在社會及構築有歸屬感的生活空間。